

上编 幽默的中国人

引 言

一位大学教授在给学生们上课，他穿了一套过时的西装，领带也未系，蓝色的衬衫领子早已洗得发白，胡子未刮，唯独头理得分外整齐，吹了风上了油。学生们在底下窃窃私议。胆子大一点的问他：“先生，您的头理得很漂亮，为何衣服穿得一点也不得体？”教授一本正经地问学生：“你们知道知识在哪里？”学生回答说：“知识当然在头脑里。”先生又指了指自己的头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答曰：“这是头发。”不以发是头脑的‘分枝’。我给头发吹风上油，是为了提高‘知识分枝’的待遇。”于是全场哄笑起来。又有学生问：“那您为何不买一套新西装以配套？”教授又说：“理一个头化了我一个星期的工资，如果还要买西装的话，恐怕我只好饿着肚子给你们上课了。所以只好别着急，慢慢地给其他部门落实政策。一切要向前看，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于是，教室里又响起了快乐的笑声。

这便是中国式的幽默。

我想起了西方一位艺术家的话：“西方人善于表情严肃地表达幽默，而中国人则善于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确实，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作为一种传统，在中国国度里由来已久。从时间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从具备这种幽默本领的人而言，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下至俳优百姓。中国式幽默的特点为谑而不虐，合于中庸；温柔敦厚，合于讽谏。即使有讽刺之味，大多以滑稽的形式出之。如上述教授的一番话便是一个例证，它的幽默比起民谣中流传的“穷教授”、“傻博士”之类的戏称要隽永有味得多，也比“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之类的隽句要含蓄得多。

中国式的幽默导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

本书上编即以时间为序，穿连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幽默故事，粗线条描绘“幽默的中国人”；下编则从中国人幽默的某些具体事例入手，来考察中国式幽默的某些特征。

第一章 讽谏滑稽的先秦秦汉人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乱时期 所谓“春秋无义战”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正是由于那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尚未形成，所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才得以出现。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那时候 作为知识分子的“士”阶层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场合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游说”来谋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样便在一方面充分地挖掘出他们自己的智慧，另一方面纷乱的世界日益呈现出其不合理性，“礼崩乐坏”旧的秩序破坏了，新秩序尚未建立，又使社会呈现出许多荒谬的现象。而知识分子对宇宙和人生则有一种比较稳定的看法 诚如孟子所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正是由于“士”阶层有他们的“恒心”亦即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思想信念 具备了超过一般人的智慧，所以他们能对纷繁不合理的世界持批判的态度。一方面不满意现实，一方面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所以他们往往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乖舛、丑拙、鄙劣当作一种有趣的东西加以嘲弄乃至

欣赏，用“笑”来撕破笼罩在各种人物关系上的假面具，使其露出滑稽可笑的真面目，幽默于是就这样产生了。

此外，先秦各国宫廷里还活跃着另外一种人物——优。这一点同英法古代宫廷里的情景差不多。《左传》《国语》《战国策》诸书里都提到过“优”的存在，《史记》更是堂而皇之地列了《滑稽列传》为优伶作传。汉初以优俳身份厕身朝廷的，有东方朔、枚皋等人。这种人物往往也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幽默的角色。先秦时期，各国国君是主人，臣下百姓是奴仆，给皇帝提意见称为“谏”，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是倡优可以是例外，他们能以戏谑的态度，用常人所不敢的滑稽、幽默的语言和动作逗国君或皇帝高兴，甚至与国君开玩笑，顺便进行讽谏，这便是所谓的“谏谑”。著名的优孟、优旃以及汉代的东方朔都玩过这一类花样，他们的一些故事早已成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典故了。

总起来说，先秦至两汉的幽默最常见的是讽谏、滑稽一类事件，而最善于创造这类幽默的有两种人：一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智慧的诸子和“游说”的谋士；二是那些善于“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滑稽多智的“优”“俳”。正是这两类人在先秦、秦汉宫廷中上演了一幕幕幽默的滑稽剧。这些宫廷滑稽剧让人们笑了两千余年，至今仍未完全失去魅力，仍然可以使人再笑若干年代。

一、上士杀人以笔端

将孔子称为中国的幽默大师大概也是始于林语堂先生。这一点也许会引来争论。确实，这位被称为“文

宣王”的“大成至圣先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位最正儿巴经的神圣人物，两千多年来早已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苏轼在《韩文公碑》一文里称韩昌黎“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语而为天下法”，用来移赠孔夫子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韩愈是无论如何也担当不起这个评语的。但是孔子则不一样。他在当时只是以一个普通教书匠的身份周游列国，十四年间栖栖惶惶地四处奔波。因为他的“道”不能实现，所以要乘桴浮于海。他在生前是一位失败者，但是他老人家死了以后却被尊为“素王”堪称“匹夫”中最尊贵的一位。他留下的片言只语都被奉为天下读书人用以律己的标准，到了明清还成为吃冷猪肉入仕林的金科玉律，享受着每一户读书人家的祭祀。他的儒家信条也成为两千余年来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思想，如今听说东南亚及港台新儒学又很兴盛起来了。这种生前死后遭遇的强烈反差，本身就是一件够幽默的事。

况且，孔子是一位大智者，具备大智慧的人总不缺少幽默。黑格尔说：“在幽默里，是艺术家人格在按照自己的特殊方向乃至深刻方向自己表现出来，所以幽默所涉及的主要是这种人格的精神价值。”（《美学》第二卷）孔子所具备的幽默，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的精神价值”。孔子一生屡遭失败而仍能保持乐天派的性格，他失败了却并不讳言，这便是孔子的幽默处。在《论语》和《孔子世家》里有很多他同学生之间的对话，他们之间经常彼此开玩笑，相互调侃。在经书以外的小说中，孔子的幽默更显得生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说郛》卷二十五中的一则故事：

孔子尝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与共战，揽尾得之，内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乎？”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又问：“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死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乃怀石盘欲中孔子，又问：“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杀人使笔端。”又问：“中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杀人用舌端。”又问：“下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杀人怀石盘。”子路出而弃之，于是心服。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但是从这篇小说看，唐宋以前人还是把孔子当成一位普通人看待的，他的话还未成为“法律（虽然唐代已到‘五经’‘九经’）”，他的话还不具备“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字字放光芒”的绝对权威。小说里孔子是一位谈话诙谐幽默、反应机智敏捷的聪明人，完全凭自己的智慧折服了他的学生，而且“笔端”、“舌端”之说骂尽了千百年来真假名士们。

孔子的一生行游四方，行其道而不得，眼见得天下乱、四方纷争而不能克己复礼，真可谓是一位怀才不遇者。但是他却活得很自在，积极地宣传他的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副热心肠，没有堕入“冷嘲”的魔道。他屡被敌人攻击，有一次甚至被围困在郊外的小客栈中绝粮数日，当他的弟子们开始有怨言时，孔子却在雨中唱起歌来。子路见了，心中十分不快，问他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最难

能可贵的是，他屡遭危险却不变幽默的本性。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讲到孔子离开曹国去宋国，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宋国的司马桓魋要杀他，将大树拔掉，孔子赶紧逃走。弟子们说：“可以速矣。”孔子却洋洋自得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能拿我怎么样？”后来到了郑国，孔子同他的弟子们走散了，孔子独自站在城东门，有位郑人对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子贡将郑人的原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欣然笑答：“我的形状描绘得不像，但说我如丧家之狗，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颜回贫穷而不减其乐，孔子则处处受挫也不改其乐，保持乐观的心态，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人类的同情。他同情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故而欲行先王之道而使天下归于“仁”。日人鹤见祐辅说过：“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

在正统的中国思想史上，孔子的道统到了宋元以后，发展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学思想，其实这同孔子本人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因此，在有人拉大旗作虎皮、代圣贤立言时，冯梦龙却在《笑林》里讲了一个以孔子为主人公的幽默故事：据说有两位道学先生议论不合，各自命为真道学，而且互相诋毁对方为假道学，很久得不到结论。于是两人都去找孔子裁判。孔子见了他们，便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道：“我的学理很大，何必一定要相同？两位先生都是真正的道学，孔丘素来是很敬仰的，哪里会有假的呢？”两人听了，都欢天喜地地去了。弟子们问孔子：“先生为什么把两个家伙捧得

这样厉害呢？”孔子说：“这种人只要哄得他去就够了，惹他做什么？”孔子在这里又是一位充满谲智，喜欢开玩笑的人物，俨然是看透了人类固有的荒谬、无耻之劣根性，而加以嘲弄了。

总之，孔子一生行事为人，幽默之处实在不少，他的幽默是积极的入世的幽默，这一点同庄子不同。观其言行常常令人想起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这位被恩格斯称为古代“最博学的人”，一生遭遇也同孔子有相似之处，非常坎坷。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他本人十七岁时到雅典向柏拉图学习达二十多年。他曾当过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又是古希腊吕克昂学校的创办者，该院又称为“逍遥学院”因为那里的老师和学生们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辩论。他从马其顿漂泊到雅典，又被流放到穆西，后来又逃亡到莱斯博斯岛，刚刚重返雅典，又再次被流放到哈尔基斯。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因有亲马其顿之嫌，被雅典的刑事法庭判处死刑，被迫离开雅典，次年便逝世了。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生前的遭遇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死后又同样受到广泛的尊重。亚翁的思想“雄霸”欧洲两千余年，几乎涉及西方文化学术的每一个领域。孔子的儒家学说则统治了中国两千余年，成了东方文化的代表。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为理想而奔波，亚里士多德也继承他老师柏拉图的衣钵，一生为“黄金国”的建立而著书立说。即使这样也并不妨碍亚里士多德的幽默，他甚至还专门研究了幽默和滑稽问题。他在《诗学》里说：“滑稽的事物令人发笑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

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他毕生行事，仿佛就是对此的实践。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是人类几千年出一个的思想家。在思维领域里，他们总是超人一等，他们总是带着悲天悯人的目光俯视人世的一切。他们企图担负起拯救人类的神圣职责，同耶稣一样，干了不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正是由于他们有超人的智慧，所以也就有了过人的幽默。“每当我们认识到对象的荒唐，并同时意识到个人的优越感时，喜剧性就产生了。”（谷鲁斯）孔子一生经历的事多，见过的人也多，一定发现了别人不少荒唐的东西。他也一定常常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所以他常常发出那种善意的微笑，嘲笑着人类的愚蠢，对芸芸众生怀着深厚的同情，尽管两千多年来他的幽默被人大大地歪曲了。

二、“道在屎溺”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曾经同章士钊进行过论争，鲁迅批评了《甲寅》、《学衡》的某些倾向。其时曾为“每下愈况”一句成语发生过一件趣事，鲁迅曾批评章士钊连成语也用不好，这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件有名的公案。

这“每下愈况”的典故即来自《庄子·知北游》文如下：

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期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

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间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这便是人们常用的成语“每下愈况”或“每况愈下”的出处。由这段话可知庄子的幽默，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而庄子却说道无所不在，甚至在“屎溺”中也有道存在，无怪那位东郭子被搞糊涂了，以为庄子在戏弄他，所以“无以应”。其实，仔细想想，不能说庄子的话没有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孟、老子以外，大概没有一个人如庄子那样对中国的思想史产生过那样大的影响，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产生过那样大的影响。人们把“老庄哲学”同儒家、佛家的学说一起作为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三大流派之一。庄子，自然也成了后世永远不会厌倦的话题，他的思想也成了取之不竭的宝库。

庄子是一座山，你从不同的角度可得到不同的印象，可以作不同的研究：哲学家、逻辑学家研究的是他的“名学”；文学家、语言家研究的是他的寓言、重言、成语典故；医学家、精神病学家则对他的“养生”之道感兴趣；至于幽默家，自然也可从庄子那里寻找中国文人幽默的根。

林语堂说：“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希腊的亚里士多

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士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吾国吾民》）确实，在先秦诸子中，大概要以庄子为第一号幽默家。晏子的幽默主要表现在外交场合；孔子的幽默则表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人生观上；而庄子的幽默则犹如他自己论“道”一样，可谓“无所不在”。更主要的是他留下的文字作品本身是一件件幽默精品，文章开头引的一则成语即是明证。

林语堂将庄子同亚里士多德相比，实际上由对中国两千年文化影响而言，好像孔子更像亚里士多德，亚翁“雄霸”西方文化两千年，孔子统治中国思想两千余年。相比之下，庄子似还未达到这一地位，在思想文化上，如果孔子是位“在朝派”的话，庄子始终是个“在野派”，所以，他更像苏格拉底，所不同的苏格拉底同亚里士多德有间接的师承关系，而庄子与孔子则没有这层关系；其次就做人而言，好像庄子更比苏格拉底“炉火纯青”一些。苏翁不得善终，庄子则始终悠哉悠哉，所谓“鸿飞冥冥，弋者何慕”是也。

唯其因为是“在野派”，庄子就比孔子更具有幽默感。虽然说他的幽默“无处不在”，我们却不可能将其一一胪列。择其要点论之，有两方面突出之处，一是表现在他那超脱的人生观上，二是表现在他那能言善辩上。

胡适说：“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是‘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

然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 都要超出‘形骸之外’这便是出世主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胡先生是以哲学家的眼光以哲学家的要求对庄子作出判断，所以对庆子的“出世主义”颇有不满意之处。但从我们谈幽默角度看，庄子玩世不恭、超脱潇洒的人生态度未始不是黑暗社会遁世之一法。他管不了人间的是是非非，所以也就不希罕世间的所谓名利。《史记》里讲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人以厚礼迎接他，并允诺以庄子为相。这本是一件旁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美事。谁知庄子对楚国的使者说：“千金是重要的礼物 作卿相 是尊贵的位置。您难道不看见郊外祭祀上用作牺牲的那只牛吗？那只牛，主人养了几年。当它入太庙作祭祀时，它即使想成为一只野外散步的野猪，它还能够吗？我宁愿在污浊的环境中游戏，求得自己快乐，不愿为掌权的人所羁，终身不仕以快我心志。”这一件事也见于《庄子》“秋水篇”只是那里以神龟取譬 稍与此不同：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于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接下去还写到另外一件事，惠子相梁时，庄子去见他 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了 将会取代你为相。”于是

惠子害怕了 在国内搜查 庄子去见他 对他说：“南方有种鸟叫鹓雏，你知道吗？它由南海出发飞往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吃，非醴泉不饮，有一只鸱衔着一只腐鼠 鹓雏飞过，鸱仰头而视发出声音‘吓！’现在你要以你的梁国而吓我吗？”在庄子这样幽默又带有讽刺的反问之下，惠子还能说些什么呢？这典故后来便成了李商隐《安定城楼》里的那句名诗：“不知腐鼠成滋味 猜意鹓雏竟未休。”

有了这样一种态度，自然可以俯视人世间的一切事，正如一个人乘着飞机，观察一艘驶在茫茫大海上的小船，舱板上的人又饥又渴，为了一块面包、一罐水在互相争斗，而这艘小船不知会驶向何方，不知何时是尽头。而飞机上的那位乘客却能欣赏茫茫的大海和蓝色的天空和那白色的海鸥，真有无数的诗情画意。这种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气概，岂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这大概也是陈涉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只是庄子的“志”与陈涉之“志”大异其趣罢了。

庄子的幽默还表现在他那连类无穷的譬喻（今人谓之“博喻”）以及善辩之上。别人会在他那巧辩之下不知如何对付，而事过之后，仔细思考一下趣味无穷。再举一个与惠施有关的故事：有一次庄子与惠施同游濠梁 庄子说：“鲦鱼出游从容 这是鱼的快乐。”惠施马上反驳说：“你又不是鱼 怎么能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不慌不忙地回答：“你不是我，又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施又说：“我不是你 当然不知道你 所以你不是鱼 也不知鱼的快乐 这是肯定的。”庄子又反驳说：“请回到开头那句话上面 你说我‘怎么知道鱼的

快乐’，证明你已知我知道鱼的快乐而问我。我知道游濠上之乐，所以也知道鱼游濠下也是快乐的。”在庄子巧辩之下，惠子无话可说。像这种犹如诡辩的对话在《庄子》一书中随处可见，不管是庄子自己的作品，还是后人假托的，但总是能反映庄子的智慧。

因为庄子是个智者，是个达者，所以他的幽默总是体现出哲学家的思辩，同一般优伶们的滑稽诙谐有所不同，他信奉的哲学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同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如出一辙，所以他能做到：“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庄子》《山木》幽默与讽刺总是有足够的智慧做后盾，运用起来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例如，有一次他从林中散步回来，神情有些沮丧，门徒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在路旁看到一个服丧的妇人跪在墓地上，手里拿一把扇子在扇一座新坟，而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干，我问她为什么，那寡妇说：‘我曾应允我亲爱的丈夫，我要等到他的坟土干了以后才会改嫁。现在，你看这可恶的天气！’”多么俏皮幽默的一则故事，不需任何点评，说尽了世态人情，这不但比《红楼梦》“好了歌”中“君生日日说君好，君死又随人去了”要隽永有味得多，而且比莫里哀、萧伯纳的某些戏剧还要耐人咀嚼。

庄子的幽默随处可见，自然不是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写尽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庄子犹如一座矿，后世的幽默家常在他那里寻到有用的东西。其中苏东坡便是一名真正的庄子信徒，他旷达的人生观、乐观幽默的性格直接源于庄子。此外，庄子还影响了其他人，正如林语堂所说：“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

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吾国吾民》）当然，这个责任是不应该由庄子来负的。

三、橘逾淮而为枳

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幽默的根在老庄和孔孟那里。如果从幽默需要智慧、幽默者需要参透人生这一角度看，大约是不错的。因为两千余年来，每一时期有幽默感的人，无论魏晋名士们或是唐宋间著名的文人居士，他们或多或少受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影响，其中苏东坡是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不过，我想，在善于滑稽讽刺的先秦人物中，晏子（婴）可称得上是一位幽默大师。因为在老庄那里，我们往往听到语言，看不到动作。而晏子则既立德又立言，活生生地出现在舞台上。

大凡稍有古代文学修养的中国人，对于记录在《晏氏春秋》中“晏子使楚”的故事一定不会陌生。

故事说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知道后对手下人说：“晏婴是齐国熟习外交辞令的人，不久将要到我国来，我想要羞辱羞辱他，用个什么法子呢？”有位大臣就如此这般地献了一计。晏子到楚国后，楚王便设宴招待他，酒喝到畅快时，只见两个官员绑着一个人走过堂下。楚王便按事先的约定问：“绑着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回答说：“是个齐国人，因为偷了东西而被抓。”楚王看了晏子一眼，问道：“齐国人原来专门偷东西吗？”这时候，晏子离开了座位，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是橘树，到了淮河以北，

就成了枳树。它们只是叶子相像罢了，果子的味道却不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水土不一样。如今人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一到楚国就偷起东西来了，莫非楚国的水土能让人专偷东西的吗？”楚王自讨没趣，感叹地说：“有学问的人是不好随便跟他开玩笑的，我本想讨便宜 结果反而自讨没趣。”这便是脍炙人口的“逾淮为枳”典故的由来。

在《晏子春秋·杂下》“第六”里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晏子使楚，楚人因晏子矮小，所以在大门旁开了个小门，让晏子从小门里进去，想借此羞辱他。谁知晏子说：“假如我出使狗国 那么我就从狗门进去 如今我出使楚国 不应该从这扇门里进去。”见到楚王后 楚王又想讨便宜 问晏子说：“齐国没有能人了吗？”晏子回答说：“临淄之地三百闾 张袂成荫 挥汗成雨 街道上摩肩接踵都是人 怎么会没有人？”楚王说：“那为何要派你出使我国？”晏子回答：“我们齐国派遣使节都各有所主，派贤能的出使有贤君之国，派不肖者出使不肖之主的国家 我最不肖 所以被派到楚国来了。”

晏子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在外交场合运用幽默机智对话折人锋芒的外交家。所以，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 他要比老、庄、孔、孟更具有幽默感。人们只要一谈起晏子，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位身长不过五尺（以现代计算大约不过一米五十五），但是脑袋里充满智慧的人物来。在关系到国家荣誉大事时，在需要面折廷争时，他常常出语诙谐，应对机巧，以睿智的语言化被动为主动。佛家有“寸刀杀人”的说法，大约晏子便是最善于用“寸刀杀人”的专家。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能翻江倒

海，决不亚于苏秦、张仪一类辩士。任何咄咄逼人的攻势，他都能轻易地化解掉。

晏子的幽默态度、机智的语言，也来源于他的智慧。他的智慧、他的治国本领使他能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而得善终，在春秋那样一个多事之秋，要历仕三朝并非易事，而在这方面，晏子的幽默大约也帮了他不少忙。

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庄公因与权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而为崔所杀，晏子适逢其事，但他并未死于君难，只是枕着庄公的尸体哭了一通，并顿足跳了三下，表示“成礼”，然后走了。人家问他为何不赴君难，他回答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据说孔子曾因这件事责备晏子，说他“见义不为，无勇也”。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正是晏子的聪明之处，为伯夷、叔齐一类愚忠人物所不可企及的。眼见一位行为失检的君主被杀，却盲目地跟着去殉葬，那实在未免太愚蠢了，智者是不为的。但是碍于礼法，他又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哭吊一番，这样才于理不亏，公私两全。这一着比起崇尚圆融通达的魏晋名士来，其潇洒处一点也不输；孔子的责备则难以服人。所以尽管有孔子那管使乱臣贼子惧怕的春秋笔在批评他，但一般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去指责晏子，反而都津津乐道于他的使楚故事。

晏子的善谈不仅仅表现在外交场合，同时也显露在对朝政的讽谏中。《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记了这样一件事：齐景公喜欢打猎，叫烛维负责养一只鹰，后来鹰飞掉了，景公大怒，要杀烛维。晏子就说：“慢，烛维